

中非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组织 过程对比分析^{*}

——基于非洲三村的田野调查

□ 郭占锋, 李小云, 齐顾波

[摘要] 基于非洲三个村庄的实地调查,通过对比中国和非洲小农在家庭层面的生产组织过程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农业正逐步摆脱“过密化”,但在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条件下又步入了“高投入—高产出的新陷阱;非洲小农家庭农业在与国家宏观农业政策相脱离的情况下,则难以走出“低投入—低产出”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 非洲;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组织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2)02-0084-0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Small-scale Household Agriculture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Three African Villages

GUO Zhan-feng, LI Xiao-yun, QI Gu-bo

(Northwest Agriculture &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three African villages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small-scale household agricul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ese small-scale household agriculture is mov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being "over-intensive", but is now stepping into a new trap of "high input-high output" because of the nee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nsuring food security. However, the African small-scale household agriculture, divorced from the country's macro-agricultural policies, is trapped in a vicious cycle of "low input-low output".

Key Words: Africa; small-scale househol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一、引言



洲国家的农业发展不仅对非洲国家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样意义重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非农业合作就已经开始,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作的强度不断加大,对非洲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纵观当前国内有关非洲农业发展的研究,大多数是集中在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

* 基金项目:瑞士联邦发展合作署(SDC)资助的“中非农业发展对比研究”(21148030)。

经济领域以及国家粮食发展战略等宏观层次上。国内学者从整体视角出发,对非洲农业生产资源与粮食状况作了细致分析;^[1]且有学者认为实施农业“走出去”是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应该做到与粮食安全相结合、与援外工作相结合、与农业贸易相结合。^[2]对非洲援助问题,尤其是援助非洲农业发展以此促进非洲减贫是近年来中非关系研究一个新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对贫困问题都实施了不同的减贫路径,与非洲国家减贫的绩效相比,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3]其中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贫困发生率逐年显著下降;并且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毫无疑问,这些宏观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作为以小农家庭农业为基础的非洲国家农业,如果完全抛开对非洲小农家庭层面的农业生产过程研究则有失偏颇。鉴于此,本文基于非洲三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试图通过对比中非小农在家庭层面的生产组织过程,以便对非洲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启示。

二、调查对象的选取

(一)中非农业都是以小农家庭为生产组织单元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即以小农为主的土地规模相对较小的生存型农业和极少量的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商品性农业。由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普遍偏低,大约有72%的人口住在农村,7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4](P6)}主要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在家庭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和重组。以利比里亚为例,虽然种植庄园的土地经营规模较大,有的在500英亩(200公顷)以上,但是占据人口70%的小农家庭却经营着全国80%以上的耕地。

相应在中国,小农家庭农业仍然是支撑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和主要生产组织形式。2007年中国农村有25 522.6万农户,94 907.5万人,在农村经营着116 427.1千公顷的耕地,^①平均每个农户拥有0.456公顷。尽管中国有国有农场1 885个,但所经营的面积也只有5 308.1千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4%。^②

当然,中国的“小农”与非洲的“小农”在概念上并非完全等同。在此,主要是从农业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来看,两者具有共性,即都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小农经济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除少数剩余的农产品能上市流通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且农产品的成本相当高,无法参与国际竞争。^[5]由此可见,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单位与非洲极

为相似,都是以分散的小农家庭为主要生产组织单元。因此,要研究非洲农业发展问题,就不得不关注小农的家庭农业生产组织过程。

(二)非洲三个调研村庄的基本情况

课题组在坦桑尼亚、赞比亚、利比里亚三个非洲国家中各选取了一个调研村庄,在每个村庄又各选取30户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坦桑尼亚A村涉及的人口总数128人,劳动力总数58人,平均每户人口为4.27人,户均土地面积为1.19公顷;赞比亚B村涉及的人口总数144人,劳动力人数为64人,户均土地面积为3.64公顷,平均每户人口为4.80人;利比里亚C村涉及的人口总数为151人,劳动力人数为64人,户均土地面积为13.20公顷。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所调查的三个村庄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坦桑尼亚A村和赞比亚B村相比,利比里亚C村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坦桑尼亚A村和赞比亚B村,高达80%以上的农户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而在利比里亚C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仅为36.6%,其余受教育水平均在初中及以上,有多达33.3%的农户受教育水平为高中,此外,还有6.7%的农户受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

非洲国家的降雨量分布非常不均匀。在三个调研国家中,利比里亚的降雨量最多,全年可以达到5 000毫米。即使在干旱季节,降雨频次也较多,适合作物生长。利比里亚小农的水稻种植一年只有一季,但是根据当地的气候,专家认为,可以种植三季杂交水稻。^③另外,非洲小农对农业生产季节缺乏合理安排,即非洲小农不刻意追求种植作物在生产季节上的时间序列性,例如坦桑尼亚A村播收玉米的时间是3~8月,而播收水稻的时间是12月或1~4月,因此8~12月或1月就缺乏时令上的连续性。除此之外,这三个非洲村庄的小农在土地空间上也几乎很少有间作和套作的实践(轮作除外,主要为保持土地肥力,表1)。

另外,本文将中国的D村作为与非洲三个村庄比较的分析对象。D村是属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一

① 200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② 200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③ 中国专家告诉笔者,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与利比里亚的BWI大学合作,派出5位农业技术专家在该大学农学系授课,讲授中国农业的耕作技术和杂交水稻栽培技术。中国南方(尤其是海南岛)气候与利比里亚极为相似,中国杂交水稻在利比里亚有较强的适应性,一年可以种植三季。但是当地农民一般只种植一季(5~10月),因此造成了生产季节上的缩短。如果比里亚农民能够一年种植三季,同时按照一定的株距和行距(一般为20厘米×20厘米)来栽培,即使不使用化肥,产量也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个村庄, 110 户, 共 440 人, 土地总面积 660 亩 (44 公顷), 25% 的土地用来种植玉米 (11 公顷), 全村有 40 人常年在外打工, 全村主要劳动力为 213 个, 其中女性 136 人。D 村每户平均拥有耕地 0.4 公顷, 每户平均种植玉米 0.1 公顷。

表 1 中非小农家庭农业耕作制度

国家	坦桑尼亚 (A 村)	赞比亚 (B 村)	利比里亚 (C 村)	中国
玉米	轮作 (2~3 年)	轮作 (3 年)	不轮作	轮作
	不间作 不套作	不间作 不套作	不间作 不套作	间作 套作
水稻	不轮作 (水田有限)	不轮作	不轮作	不轮作
木薯	轮作 (增加肥力)	轮作	轮作 (增加肥力)	——

数据来源: 课题组 2009 年的非洲实地调查。

三、中非小农家庭农业的生产技术应用对比

(一) 中非小农玉米生产过程对比

中国小农在整个玉米种植环节 (整地、灌溉、除草、收割等) 过程中, 人力、畜力投入越来越被机械所替代。2007 年底, 中国玉米机播水平达到 60.47%,^① 同时中国小农生产中新技术采用更突出地表现在新品种及其配套的农药、化肥、除草剂、浇水等整套技术。机械技术的扩散与近几年非农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 中国农村大量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使得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打破。目前, 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 2.25 亿, 并由此产生了 4700 万留守妇女,^[6] 农业女性化的特点愈加凸显。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和城市高工资的驱动下, 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成为家庭劳动力配置和性别分工的理性选择, 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成为必然趋势。^{[7][8]}

中国 D 村小农的玉米种植一般是从 4 月 10 日前后开始的。整地是第一步, 这个过程分为细耕和修垄两个环节, 以达到松软和保墒的目的; 接着就是覆膜。播种时要按照行距 70 厘米, 株距 18 厘米进行。种植过程中施肥两次, 其中追肥一次; 喷农药三次, 其中包括一次除草剂和两次杀虫剂; 灌溉二次, 播种前灌溉一次, 开花期也灌溉一次, 这时玉米对缺水反应最敏感的时期。农民所说“开花不灌, 减产一半”就是强调此时灌溉的重要性。最后的收获阶段也是以机械和人力相结合。

由于非洲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 因此大部分非洲小农都是在雨季进行玉米种植。坦桑尼亚 A 村小农从 3 月开始播种; 赞比亚 B 村小农种植玉米也集中在雨季 (11~12 月); 利比里亚 C 村小农玉米种植是从 4 月开始。这三个非洲村庄小农在玉米种植时也同样有行距和株距的概念。坦桑尼亚 A 村的

玉米行距为 90 厘米, 株距为 60 厘米。播种时每个坑里两粒种子, 也要进行间苗。以前用传统的种子, 播种时每个坑里 4~5 粒种子, 如果全部发芽, 也需要间苗, 无需灌溉和施肥以及打农药。赞比亚 B 村的玉米播种也是人工点播, 行距大约为 70 厘米, 株距为 30 厘米。等玉米出苗以后, 会进行间苗和补植。由于没有任何机械, 并且也没有耕牛, 平整土地基本上是靠人工。在平整土地之后, 也不进行修垄, 而是直接点播, 使用的农具也非常简单。玉米播种下去以后, 无需灌溉和施肥, 也不喷农药, 除草和收获主要借助人力, 一直等到来年的 5 月开始收获玉米。玉米收获只是将玉米棒收走, 并不处理秸秆。利比里亚推广人员要求小农播种玉米时按照行距大约 60 厘米, 株距大约 30 厘米进行, 但是大多数 C 村小农都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播种, 而是随意播种, 而且播种时每个坑里有 3~4 个种子, 全部发芽后也不间苗, 更不进行灌溉和施肥以及喷洒农药等活动。

除了极少数农户使用机械之外, 非洲绝大多数农户都是依靠雇工和家庭劳动力进行玉米种植。通过调查得知, 这三个非洲村庄小农使用传统农具的比例非常高, 都在 80% 以上, 其中利比里亚 C 村小农使用传统农具的比例高达 100%。在农忙季节, 互助和雇工则成为缓解单个家庭劳动强度的主要形式。农户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力的比例较高, 坦桑尼亚 A 村占 60%, 赞比亚 B 村占 54%, 而利比里亚 C 村高达 87%。同样在非洲国家, 甚至中型农场在农业生产中很少进行机械化的操作, 也很少应用现代生物技术, 更多地还是以本土的传统技术为主。

(二) 中非小农玉米种植的“投入—产出”对比

以玉米种植为例, 赞比亚 B 村平均每户有 3.64 公顷, 每户种植玉米 1.365 公顷, 占 37.5%; 坦桑尼亚 A 村每户平均 1.19 公顷, 每户平均种植玉米 0.98 公顷, 占每户耕地 82.4%; 中国 D 村每户平均拥有耕地 0.4 公顷, 每户平均种植玉米 0.1 公顷, 占 25% (表 2)。从每公顷投入来看, 中国 D 村小农在化肥、农药、种子、除草剂、灌溉和机械使用率远远高于赞比亚 B 村和坦桑尼亚 A 村。

中国每公顷投入成本共计 847.6 美元, 而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分别为 14.59 美元和 25.04 美元。在所有投入当中, 中国的化肥投入占了很大的比例, 而赞比亚每公顷化肥投入仅为 1.776 美元, 坦桑尼亚被调查的 30 户农户都没有使用化肥。据坦桑尼亚宏观统计资料显示: 86% 的农户从未使用肥料, 其中 98% 的为最穷的人; 72% 的农户从未使用除草剂, 其

① 2008 中国农业年鉴,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中 84% 的为最穷的人, 77% 的农户从未使用过改良品种, 其中 89% 为最穷的人。^① 这些数据与微观层面基本相一致。国外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 非洲小农几乎都没有购买化肥的支付能力, 更别说大量使用化肥。^{[9](P87~112)}

表 2 中国、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玉米投入产出比较

	赞比亚(B村)	坦桑尼亚(A村)	中国(D村)
平均耕地(公顷/户)	3.64	1.19	0.4
平均玉米面积(Ha/户)	1.365	0.98	0.1
化肥支出(美元/Ha)	1.776	0	266.3
农药支出(美元/Ha)	0.66	0.27	110.9
种子支出(美元/Ha)	10.53	5.90	55.5
雇佣人力(美元/Ha)	1.62	18.87	11.1
机械支出(美元/Ha)	0	0	177.5
除草剂(美元/Ha)	0	0	26.6
灌溉支出(美元/Ha)	0	0	199.7
投入合计(美元/Ha)	14.59	25.04	847.6
粮食产出(公斤/Ha)	430	580	6750
粮食产出(美元/Ha)	86(0.2)	133.4(0.23)	1250(0.186)
土地生产率	20.4%	18.7%	210%

说明: 以玉米为例, 主要考察赞比亚 B 村, 坦桑尼亚 A 村和中国关中 D 村的投入产出。

从玉米的产量来看, 中国每公顷的产出可达 6 750 公斤, 而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每公顷的产出则分别为 430 公斤和 580 公斤。如果按照 2008 年各国的玉米价格计算, 中国每公顷的玉米收入 1 250 美元, 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则分别为 86 美元和 133.4 美元。从土地生产率来看, 中国的每公顷土地生产率可以达到 210%, 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分别为 20.4% 和 18.7%。因此, 中国每公顷较高投入和较高的产出支撑了非常高的土地生产率, 使得单产非常高, 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满足了小农的粮食安全。

相反, 非洲小农对消耗性资金和生产性资金的获得性都不高,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非洲小农的耕作过程简单粗放, 缺乏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另一方面, 非洲的正式农村金融机构排斥农户的信贷需求, 而且贷款数量极少, 因此, 小农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在非洲三个调研村庄中, 国家对小农的信贷十分有限, 很难从正式渠道获得金融资本。在调查农户中, 仅有坦桑尼亚 A 村一位农户从“小银行”(small bank) 获得数目非常少的贷款(58 000 先令, 相当于 290 元人民币), 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但是, 在缺乏自身的资金积累, 又没有外部资源补贴的情况下, 小农对于贷款的需求是迫切的。在赞比亚 B 村发现, 100% 的农户均有贷款需求, 理由是只有贷款才能买得起化肥, 而在雨季种植玉米的时候如果能够增施一次化肥, 产量就可以提

高近三分之一。

四、中非小农家庭农业与国家农业政策

中非小农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系统, 除在家庭内部进行资源要素配置之外, 还受到来自家庭外部的国家农业政策的影响。农业补贴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措施, 对于促进农业发展意义重大。2004 年以来, 中国小农先后从“四减免”“四补贴”政策中获益很多, 这意味着中国粮食补贴制度从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转变为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 从国家农业宏观层面上的补贴转为农户微观层面上的补贴。

在促进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的采用率方面, 要素投入补贴成为一种有效方法。对于一种或几种与新技术相关的要素投入(比如化肥、杀虫剂或种子)进行补贴, 能够提高新技术的盈利概率, 同时降低风险。^[10] 以湖南省湘阴县粮食补贴政策为例, 2009 年, 全县补贴面积 3.193 万公顷, 粮食直补 202.5 元/公顷, 农资综合补贴 1 209 元/公顷, 良种补贴: 早稻 150 元/公顷、中稻 225 元/公顷、晚稻 105 元/公顷。学者通过对该县的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情况进行调研, 发现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后, 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调整为粮食直补, 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 保护了粮农利益, 体现了公共财政调节收入分配职能。调研数据显示, 2004~2008 年湖南省湘阴县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均有显著提高。^[11] 从理论上推算, 一个中国小农种植 1 公顷双季稻, 那么粮食直补、农资综合和良种补贴共计 246.5 美元/公顷, 占到每公顷总投入 671.74 美元的 36.69%。由此可见, 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也形成了国家政策与农户之间直接的良性互动格局, 国家宏观农业发展与小农家庭农业紧密相连, 互相促进。

与此同时, 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对农户生产行为干预很少, 几乎采取了放任的政策。在非洲国家农业宏观发展战略上, 缺乏对农业总体的政策支持以及倾向性的投入; 在微观层面上, 农户难以得到农业补贴, 也缺乏获取农业技术信息的机会和渠道, 多数农民的农业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耕作体系。非洲调研三国的小农也几乎没有来自国家的农业补贴。在坦桑尼亚 30 户调研农户中仅有 4 户从政府手里得到过 2 公斤玉米良种补贴。在赞比亚, 国家对土地经

① Views of the People 2007, REPOA, 2007, P114.

营规模较大的农场都没有任何政策支持,就更不用说对小农有农业支持政策。据 Makombiro 农场的农场主介绍,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就连在赞比亚广为宣传的化肥补贴,该农场主表示也没有得到过,也从来得到过任何的农业贷款。但的确不用交纳任何税费,除了每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土地使用费(280 公顷共计 85000 卡瓦查,相当于 136 元人民币)。显而易见,非洲国家农业发展与小农家庭农业生产呈现分离状态、且缺乏相互支持。

五、结果与讨论

小农家庭农业是中非农业的共同本质,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小农在家庭范围内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家庭成为小农农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单元。固然土地、水、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非小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呈现出巨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中非小农家庭种植过程中的技术使用情况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方面的差异。通过上述中非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组织过程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一)中国小农家庭农业正逐步摆脱“过密化”,但在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条件下又步入了“高投入—高产出(单产)”的新陷阱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由此导致小农家庭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得“农业女性化”和“农业老龄化”现象更加凸显,这正是小农在家庭农业生产组织过程中对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性别分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的“市场理性”。显而易见,中国小农逐步从“生存伦理”^[12]的内生型生计策略转向“生存理性”^[13]的外向型生计策略,并有逐步摆脱农业“过密化”^[14]的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国家对小农家庭农业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都非常大,有力地促进小农家庭农业的发展,最终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由于土地规模较小,中国小农普遍对农业生产性信贷获得性不高,然而这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小农对农业生产的“高投入”趋势。因此可以说,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但是与历史上“低投入—低产出”小农经济体系已经明显不同。当前,中国小农在“高投入—高产出”模式的诱致下,对现代农业技术呈现积极接纳的态度,导致化肥、农药等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使用水平。

(二)非洲小农家庭农业在与国家宏观农业政策

相脱离的情况下,难以走出“低投入—低产出”的恶性循环

非洲小农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对现代农业技术投入异常不足。非洲国家的土地利用效率很低,利比里亚的土地利用率仅为 15%。另外,非洲小农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作技术(水稻不育苗)不够重视,加之,生产性资金的获得性十分低下,由此导致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化肥、农药、锄草剂、灌溉设施等)的投入非常缺乏,使得土地生产率很低,已经陷入“低投入—低产出”的简单循环之中。在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分工方面,非洲小农则依赖农闲的特殊时段而非理性的“算计分工”。维持家庭生计安全仅维系在非常单一的农业、种植业的生产活动。即使将非洲小农定位于“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发展阶段,这种情况也很难保持长久的均衡状态。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总体对农业发展不够重视,尤其没有形成规范、统一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体系,相对于中国而言,非洲国家对小农的政策或资金支持都是非常少的。总体而言,非洲小农家庭农业生产依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外部的有效资源输入严重匮乏,导致国家的农业发展战略与小农家庭农业发展相分离,从而造成了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在小农家庭农业为主体的背景下,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粮食自给是彼此关联的。^[15]中国将小农家庭生产作为国家粮食发展战略一个重要部分的做法,可以为非洲农业发展战略中对小农家庭农业的定位提供一定的启示。

(三)相关建议

小农家庭农业是国家农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缩影,要发展非洲国家的农业,就不能不重视对非洲小农家庭农业生产与组织运行情况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比较中非小农家庭生产组织过程,可以看出非洲农业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在新时期要大力发展非洲农业以及深入推进中非农业合作,笔者建议:

第一,非洲国家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积极引导非洲小农转变土地经营模式。非洲小农家庭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这是发展农业的首要条件,只要能将“粗放式经营模式”变为“集约化经营模式”,同时采用适当的农业生产技术,那么非洲农业会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第二,非洲小农要走出“低投入—低产出”的恶性循环,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从生产要素投入的效率来看,中国农业的“高投入”并不是会长久带来“高产出”,相应已出现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并对资源与环境构成巨大的压力。然而,非洲的农业发展正处于生产要素报酬大幅度递增时期,有

条件避免中国农业发展的教训和不足,选择适合于非洲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第三,非洲小农家庭农业对国家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要给予准确的战略定位。非洲国家应该将小农家庭农业发展纳入国家宏观农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当中,并且付之于行动,加强对小农家庭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使得小农家庭农业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证的基础。

第四,有关非洲小农家庭农业的研究不仅有待于深入,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介绍与拓展。当前中国援非人员大多是来自自然学科领域,对于非洲小农的社会心理、家庭组织结构、农业历史文化等关注不够。因此,在中非农业合作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国家要支持和鼓励人文社科的学者,尤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农业推广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介绍对非洲农业的研究,而且要实现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整合,重点对非洲小农家庭的社会文化、邻里互助模式、农业小额信贷、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国家政策法律、民族宗教、文化民俗等领域进行研究,以此深入研究非洲小农家庭农业与非洲农业发展。

当然,本文对于中非小农家庭农业研究是基于十分有限的数据,而且具有尝试性,尤其是数据代表性问题容易受到质疑。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有53个国家的非洲大陆要和中国对照分析,的确存在方法论问题,但笔者相信,通过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与推进,中非农业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都会不断有所突破,从而促进中非农业的深入合作与非洲农业整体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李淑芹,石金贵.全球粮食危机与非洲农业发展[J].世界农业,2008,(10).
- [2]陈颖,陈辉.农业走出去是个大战略[J].农业经济问题,2007,(4).
- [3]安春英.中非减贫领域经验及互鉴[J].亚非纵横,2009,(6).
- [4]Sami Zaki Mouss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No 72[A].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Agricultural Growth in Africa[R].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2.
- [5]王冰.论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再造[J].岭南学刊,2004,(6).
- [6]张俊才.5000万“留守村妇”非正常生存调查[J].中国经济周刊,2006,(40).
- [7]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1994,(2).
- [8]李实.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 [9]Holme'n, H. The State an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G. Djurfeldt, H. Holme'n, M. Jirstrom and R. Larsson (eds), The African Food Crisis: Lessons from the Asian Green Revolution[M]. Wallingford: CABI Publishing, 2005.
- [10][美]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1]杨林.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绩效评析及其政策调整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5).
- [12][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13][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4][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5]Djurfeldt, G, Holme'n, H, Jirstrom, M and Larsson, R (eds), The African Food Crisis: Lessons from the Asian Green Revolution[M]. Wallingford: CABI Publishing, 2005.

收稿日期 2011-11-08

[责任编辑 韦光化]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郭占锋(1977~),陕西咸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陕西杨凌,邮编:712100。李小云(1961~),陕西定边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农村发展理论与中国减贫,北京,邮编:100193。齐顾波(1970~),女,贵州安顺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北京,邮编:100193。